

美国亚太盟伴网络构建路径的类型化分析^{*}

韩召颖 李 源

【内容提要】 推动轴辐体系向盟伴网络转型扩展,是美国亚太联盟建设的重要内容。轴辐体系是一种结构相对简单的网络形态,正在形成的盟伴网络则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网络规模并提高网络内的相互联系程度。美国构建盟伴网络旨在获取盟伴在其所需的特定领域的资源,从而维持主导地位、增强竞争优势,而盟伴网络的三个结构特征有助于美国实现该目标,即盟伴之间横向联系的增强、相互强化的合作机制与差异化的节点位置。根据网络内的节点构成与联系领域两个维度,美国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的基本路径可分为四种类型:联盟内安全网络建设、联盟内议题网络建设、联盟外安全网络扩展,以及联盟外议题网络扩展。不同构建路径共同推动美国亚太盟伴网络的形成与强化,并在该过程中发挥差异化作用。该框架为考察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盟伴政策实践的延续与变化提供了类型化分析工具,有助于理解美国亚太盟伴网络的不同层次与演进趋势。

【关键词】 美国亚太联盟 轴辐体系 联盟转型 盟伴网络 联盟设计

【作者简介】 韩召颖,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zhaoyinghan@nankai.edu.cn

李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liyuan9916@163.com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24VRC058)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号:23VMG025)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提出

联盟是美国建立与维持霸权秩序的重要基础。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轴辐式”(hub-and-spoke)的不对称双边联盟体系。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亚太联盟结构设计推动轴辐体系向盟伴网络(network of allies and partners)转型扩展。2016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Baldwin Carter)指出,美国致力于建立有原则、包容性的安全网络(principled and inclusive security network)。^①在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下,以美国为中心、“以规则为基础”的亚太安全网络逐渐形成。^②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采取“美国优先”的外交原则,以交易主义的态度对待联盟关系,这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受到一定冲击,但其联盟政策的本质仍为有重点、有选择性地构建盟伴网络。2019年6月,特朗普政府发布首个《印太战略报告》,该报告以“预备措施、伙伴关系与促进网络化区域建设”(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为副标题,强调美国要通过三边和多边安排加强双边合作,并鼓励盟国与伙伴发展相互关联的安全关系。^③拜登政府视盟国与关键伙伴为“力量倍增器”与“战略资产”,更加重视以各类合作机制建立美国、盟国与伙伴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亚太联盟体系进行了系统化、精细化的调整与布局。

美国不同政府如何在亚太地区构建盟伴网络?它们具体采取了哪些路径?这是本文试图解释的核心问题。本文首先在概念上厘清轴辐体系与盟伴网络的关系,并从盟伴网络本身的结构特征出发,解释美国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的动力;其次,根据网络内的节点构成与各节点建立联系的议题领域两个维度,提出一个关于美国亚太盟伴网络构建路径的类型化框架;最后,通

① Ash Carter, “The Rebalance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Building a Principled Security Network,”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6, 2016, pp. 65-75.

② 左希迎:《特朗普政府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50页。

③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June 1, 2019, p. 44-49, <https://apps.dtic.mil/sti/tr/pdf/AD1082324.pdf>,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30日。

过该框架分析美国不同政府在盟伴网络构建实践上的延续与变化。

二、既有研究回顾

围绕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转型变化,既有研究主要存在三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一类关注亚太联盟网络转型的原因,从联盟功能不足、美国需求、盟伴施动与网络效应等多个视角,解释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演进;^①第二类着重分析亚太联盟体系转型的困境及前景;第三类聚焦联盟体系转型的过程,探讨亚太联盟体系向盟伴体系或盟伴网络转型过程中的设计特征,此类研究往往暗含着对盟伴网络构建路径的讨论,与本文的研究问题最为接近,相关研究可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注美国、条约盟国与战略伙伴之间相互交织的合作关系。既有研究普遍认为,传统亚太联盟体系在美国与盟国、不同盟国之间关系强化的基础上,逐渐转向“美国+盟国+伙伴”的关系网络。^②有学者以“轴辐+”(Hub-and-Spokes “Plus”)的网络化模式描述亚太联盟体系的转型,强调美国推动传统的条约盟国重新洗牌,并将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新的安全合作模式,推动美国、盟国与伙伴之间加强协调。^③还有学者引入“支点国家”的概念,强调美国在构建“印太战略”时不局限于传统的东亚军事盟国,而是争取更多元的盟伴成为混合支点或地缘政治/经济支点。^④“盟伴体系”被广泛用

① 关于此类研究的系统梳理与总结,参见张耀:《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逻辑——基于推论性网络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5期,第103—131页。

② 参见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39页;吴心伯:《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第60页;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12—13页;左希迎:《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第4—28页。

③ Thomas Wilkins, “A Hub-and-Spokes ‘Plus’ Model of US Alliances in the Indo-Pacific: Towards A New ‘Networked’ Design,” *Asian Affairs*, Vol. 53, No. 3, 2022, pp. 457-480.

④ 赵菩、李巍:《霸权护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升级》,载《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4期,第24—46页;张耀:《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战略工具、内在限度与中国应对》,载《战略决策研究》,2024年第6期,第15—35页。

来描述美国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对联盟体系的调整,即美国力图促进条约盟国与“志同道合伙伴”之间的横向耦合。^①

第二,分析盟伴体系内的小多边合作方式,主要围绕其特征、对构建盟伴网络的作用以及类型设计等方面。相较于多边主义,小多边主义被认为在成本与效率上具有一系列优势,例如针对性、融合性、可操作性与协调便捷性、议程设置有效性、自愿参与和非正式性等。^② 小多边主义成为盟伴体系内各国重要的合作方式,是传统轴辐结构下安全合作机制的延伸。网络化的安全架构因此是指美国与盟友、伙伴之间相互重叠的双边、小多边和多边防御安排。^③ 小多边主义还具有明显的议题导向。借助小多边主义,美国得以在多个议题上与盟伴实现政策协同,从而助推其打造多层次、网络化、嵌套式的盟伴架构。^④ 与小多边主义类似,议题性联盟作为盟伴体系内的国家间合作方式也受到关注,有利于推动内部整合,修复、补充与强化盟伴体系。

既有研究也涉及盟伴体系内小多边合作的不同类型。叶晓迪根据美国对高低政治议题的偏好,将小多边合作分为全域型、制度型、安全型和现状

① 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26—55页。

② 关于小多边主义的优势,可参见赵祺、罗圣荣:《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载《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2期,第65—79页;李途:《美英澳伙伴关系与“印太”地区阵营化:基于小多边主义的考察》,载《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6期,第95—108页;包广将、饶金山:《美国塑造印太秩序的小多边主义路径》,载《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3期,第111—132页;William T. Tow,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2, 2019, p. 235; Stewart Patrick, “The New ‘New Multilateralism’: Minilateral Cooperation, But at What Cost?” *Global Summitry*, Vol. 1, No. 2, 2015, pp. 120-125; Victor Cha, “The Dilemma of Regional Security in East Asia: Multilateralism versus Bilateralism,” in Paul F. Diehl and Joseph Lepgold, *Regional Conflict Management*,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pp. 104-122。《澳大利亚国际事务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24年10月也发布一期关于“小多边主义与印太秩序”的特刊。

③ Matteo Dian and Hugo Meijer, “Networking Hegemony: Alliance Dynamic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No. 2, 2020, p. 132.

④ 赵明昊:《美国构建亚太“小多边”机制的进展、特征与影响》,载《当代世界》,2023年第3期,第39—45页。

型四类。^① 还有学者将盟国间互动理解为整合型小多边安全合作,而将联盟与安全伙伴的互动称为拓展型小多边合作。^② 梅森·里奇(Mason Richey)则从四个方面理解小多边合作的不同类型:制度化程度、与多边主义的关系、与美国领导的双边联盟架构的关系,以及供给产品类型(俱乐部产品还是公共产品)。^③ 此类研究关注到美国或其盟伴如何设计小多边合作的问题,反映出小多边合作不是自然生成的。

第三,从盟国视角看待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转型。美国的轴辐体系正在转向“节点防御”(nodal defence)式的混合联盟结构,不同位置的节点国家基于功能专业化分别承担四种角色:安全保障国、区域枢纽、局部枢纽与利基国家。^④ 董柞壮指出,美国和盟国共同推动亚太联盟体系的转型调整,在此过程中盟国扮演三种角色,即霸权代理者、中间商与利用联盟体系的国家。^⑤

在以上背景下,有学者强调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呈现“复合”特性,提出复合联盟、复合盟伴体系、复合型模块化联盟等概念。^⑥ 然而,这也引发学者们反思各类合作关系的扩展延伸与联盟概念之间的张力。费利克斯·海杜克(Felix Heiduk)等强调,现有研究存在一种错误倾向,即将每种国家间的

① 叶晓迪:《美国“印太”小多边主义的生成机制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3期,第94—126页。

② 李德杰:《体系的羁绊:亚太小多边安全合作的互动逻辑》,载《国际展望》,2024年第2期,第121—140页。

③ Mason Richey and Daewon Ohn, “‘It’s Fine in Practice, but How about in Theory?’ State-of-the-art Minilateralism between Expectations and Real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6, 2024, pp. 782-807.

④ Luis Simón, Alexander Lanoszka and Hugo Meijer, “Nodal Defence: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U. S. Alliance System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44, No. 3, 2021, pp. 360-388.

⑤ 董柞壮:《盟友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中的作用与限度》,载《战略决策研究》,2024年第5期,第42—50页。

⑥ 参见张景全、罗华婷:《拜登政府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及中国应对》,载《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6期,第36—53页;刘国柱:《复合型模块化联盟:拜登政府应对大国竞争的联盟战略》,载《同济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34—49页;郑海琦、李家胜:《美国印太复合联盟的构建及影响评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4年第1期,第61—79页。

安全合作工具都称为“联盟”，小多边主义尽管具有类似联盟的目的或功能，但本质上不符合正式军事联盟的基本属性。^① 刘丰指出，联盟体系正在向盟伴网络扩展，美国盟伴网络是基于议题的联合阵线，因此不能仅在传统联盟理论的视角下进行分析，而是需要区分盟伴网络中不同性质的合作类型。^②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从不同方面分析了美国亚太盟伴网络相比于传统双边联盟体系的设计特征。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分析美国如何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美国采取了哪些构建路径，以及不同路径对亚太盟伴网络的形成是否具有不同效果。对美国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的路径进行类型化分析，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并展示盟伴网络的内部差异。此外，现有研究较少对美国不同政府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的实践进行比较考察。有学者利用社会网络方法，展示了美国亚太安全网络的历时演化，但其聚焦于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最终形态而非构建路径。^③ 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政府在盟伴网络的构建实践上是否具有延续性，不同政府所侧重的构建路径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分析。

三、美国对亚太盟伴网络的设计：动力与路径

在厘清盟伴网络与双边联盟体系的关系后，本文试图分析美国如何通过构建盟伴网络维持主导地位、增强竞争优势，并对美国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的基本路径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区分盟伴网络内的不同合作层次。

（一）双边或多边联盟体系与盟伴网络

在结构上，联盟可分为双边联盟与多边联盟。冷战初期，美国在亚洲地

① Felix Heiduk and Thomas Wilkins, “Minilateralism and Pathways to Institutional Progression: Alliance Formation or Cooperative Security Govern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6, 2024, pp. 808-827.

② 刘丰：《从联盟体系到盟伴网络：概念厘清与理论适用性探讨》，载《战略决策研究》，2024年第5期，第3—15页。

③ 张耀：《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网络化的逻辑——基于推论性网络分析》，第103—131页。

区建立以其为中心的多组双边联盟,而在欧洲地区建立多边联盟体系。既有研究探讨了不同联盟结构建立的原因及其效应,一方面提出集体认同、历史记忆、不干预规范、高压攻势(powerplay)与威胁水平等因素来解释美国为什么没有在亚洲地区建立多边联盟体系;^①另一方面分析了不同的联盟结构对于联盟内部互动的影响。^②而盟伴网络或盟伴体系的概念捕捉到两类联盟结构在新形势下的变化,即美国、盟国与伙伴国之间逐步建立相互交织、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双边或多边联盟体系与盟伴网络的关系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双边或多边联盟体系与盟伴体系都是一种网络形态。对于北约这一多边联盟体系,各成员国通过共同签署集体防御条约形成关系网络。而亚太地区的多组双边联盟关系构成一种双边联盟体系,该体系表现为轴辐式结构,即以美国为中心,各国分别与美国建立联盟关系,但各国之间不存在正式的联盟关系。轴辐体系本身就是一种结构相对简单的网络形态。车维德(Victor Cha)就强调双边联盟的聚合形成独特的轴辐网络,紧密的双边主义是该联盟网络的基础。^③因此,严格来讲,以“网络化”一词描述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调整变化并不十分准确。“网络化”通常是指从非网络状态向网络状态转变的动态过程,而盟伴网络是在既有轴辐式联盟网络的基础上

① 参见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2002, pp. 575-607;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 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2009, pp. 158-196; Kai He and Huiyun Feng,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Revisited: Prospect Theory, Balance of Threat, and US Alliance Strategi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2, 2011, pp. 227-250; Yasuhiro Izumikawa, “Network Connec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Hub-and-Spokes Alliance System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5, No. 2, 2020, pp. 7-50.

② 参见周建仁:《战略信誉、同盟结构与同盟弱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1—50页;程志寰、李亨:《同盟分歧背景下美国境外核部署的逻辑》,载《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2期,第148—184页。

③ Victor Cha, “Informal Hierarchy in Asia: the Origins of the U. S.-Japan Alli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7, No. 1, 2017, p. 25.

与更多的节点建立联系,扩大网络规模,提高网络内的密度与相互联系程度。

其次,盟伴网络在构成基础等方面不同于双边或多边联盟体系。在成员构成上,双边与多边联盟体系的成员均为条约盟国,盟伴网络则表现为条约盟国+合作伙伴。两者围绕成员构成的表层差异反映出关系基础的深层差异。标准的双边或多边联盟关系以国家间正式的联盟条约为基础,联盟承诺与义务构成网络内各节点的“联系”(tie)。^①其反映的是严格意义上的联盟概念,即国家间就是否使用军事力量而形成的签有正式盟约的联合。^②正式盟约的签署向盟国和对手提供了关于未来行为的信息。书面条约规定了盟国的义务范围,即盟国在什么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具体包括进攻性、防御性、中立性、互不侵犯与协商性等不同形式,同时也明确了盟国安全承诺的强度。^③在双边或多边联盟体系中,特定成员根据联盟条约的具体条款确定并履行安全义务,在缔结联盟前后会精心设计条款文本,以提高联盟可靠性、降低被牵连等风险。而盟伴网络则是联合(alignment)、联盟(alliance)与阵线(coalition)等不同强度的合作形式的混合,^④既包含正式的联盟关系,也涉及非正式的各类“伙伴关系”。此类非正式合作并不基于明确的联盟条约文本,通常表现为共同声明、联合宣言、谅解备忘录、高层会晤等方式,各方可以灵活地针对不同的具体议程开展合作,而不需要作出明确的、具有约束性的承诺。

最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联盟体系与在欧洲地区的多边联盟体系都在向盟伴网络扩展。有研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从外交、军事与经济三个层

① 刘丰、董柞壮:《联盟网络与军事冲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70页。

②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0. 利兹也强调,“联盟是由至少两个独立国家的官方代表签署的书面协议”。参见 Brett Leeds, et al,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8, No. 3, 2002, p. 238.

③ Brett V. Benson and Joshua D. Clinton, “Assessing the Variation of Formal Military Allianc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0, No. 5, 2016, pp. 866-898.

④ 参见 Thomas Wilkins, “‘Alignment’, Not ‘Alliance’-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No. 1, 2011, pp. 53-76; 刘丰:《从联盟体系到盟伴网络:概念厘清与理论适用性探讨》,第3—15页。

面,系统评估了美国联盟体系向盟伴网络的转变。^①除亚太地区的轴辐体系正在向盟伴网络扩展外,北约也将伙伴关系作为处理与非北约国家的制度框架,形成了不同制度化程度、政治目标、职能范围和参与国家的伙伴关系模式,其伙伴可分为三类:寻求加入北约的伙伴、北约周边不太可能成为成员候选国的伙伴,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志同道合国家。^②冷战结束之初,北约便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以伙伴关系建立与原华约国家不同程度的合作,并成功实现在中东欧地区的扩员,部分国家率先由“伙伴”升级为“盟友”。^③北约还与地中海沿岸国家设有“地中海对话”,与中东国家建立“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并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九国列为“全球伙伴国”。北约向盟伴网络的扩展与其在冷战后积极推动职能转型密切相关。伙伴关系被认为是北约适应不断变化的安全格局的基础,也是北约联盟关系的“力量倍增器”,能够增强联盟力量、扩大联盟影响力。^④因此,盟伴网络并非是介于双边和多边联盟体系之间的状态,双边联盟基础上的盟伴网络可能会进化为多边联盟基础上的盟伴网络,其中,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能够解释双边向多边联盟转型的成败,^⑤而多边联盟基础上的盟伴网络也可能进一步实现伙伴向盟友的关系升级。盟伴网络的产生是美国和盟国为满足战略需求不断推动联盟转型的结果。

① King Mallory et al., *U. S. Alliance and Partner Networks: A Network Analysis of Their Health and Strength*, RAND Corporation, 2024,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066-1.html,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27日。

② Markus Kaim, *Reforming NATO's Partnerships*,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2017,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cations/products/research_papers/2017RP01_kim.pdf,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27日; Daniel S. Hamilton and Hans Binnendijk, *One Plus Four: Charting NATO's Future in an Age of Disruption*, NATO Task Force Report, 2022, p. 11, <https://www.transatlantic.org/wp-content/uploads/2022/02/NATO-TF-SC-final-feb-16-2022.pdf>,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27日。

③ 有学者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先后次序问题,参见周建仁、欧高荣:《冷战后北约东扩次序的逻辑》,载《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4期,第1—37页。

④ Anna Dowd, “(Out-)Partnering for A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Revitalizing NATO's Approach to Partnerships,” in Regina Karp and Richard W. Maass,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in A Complex and Challe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Virginia: Headquarters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Transformation, 2024, pp. 178-179.

⑤ 黄宇兴:《谈判能力与联盟转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77—101页。

(二) 盟伴网络的结构特征与美国的构建动力

网络是由多个节点和各节点之间的连线组成的集合。在社会网络分析中,节点之间的联系是资源传递与流动的渠道。^① 美国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的动力源于其对实现资源传递的需求,即让盟伴投入更多资源,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议程予以政治支持和行动配合,进而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强化竞争优势。实际上,当从属国与主导国建立联盟关系时,对主导国政策的公开支持与外交协调是其所需提供的重要非军事产品。^② 具体而言,亚太盟伴网络的三个结构特征有助于美国在其需要的领域获取盟伴的资源与力量,强化网络内部的协调合作,从而以相对低的成本满足美国的战略需求。

第一,盟国与盟国、盟国与伙伴国之间横向联系的增强。这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议程紧密相关,有助于盟伴通过反复合作增强相互信任,获取彼此可靠性、利益分配与合作偏好等信息,降低合作中的不确定性。盟伴之间的联系越多,越容易实现彼此政策的协调。盟伴在投入更多资源的同时获取与共享资源,促进了资源的分散流动,从而减轻美国单方面承担的战略负担。有研究表明,双边防务协议增加国防开支,但愈发密集的防务协议网络却产生抵消作用,能够通过促进政策趋同、减少合作成本与提高效率的方式降低国防开支。^③

第二,相互强化的合作机制。联盟本身是一种制度化的合作形式,除正式的双边联盟关系以外,美国作为主导国还与不同盟伴形成各类双边或小多边机制,这些不同制度化水平的合作机制^④在成员与议题上存在重叠。美

① 斯坦利·沃瑟曼、凯瑟琳·福斯特著,陈禹、孙彩虹译:《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② Tongfi Kim, *The Supply Side of Security: A Market Theory of Military Allia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49-55.

③ Brandon J. Kinne and Stephanie N. Kang, "Free Riding, Network Effects, and Burden Sharing in Defense Cooperation Network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7, No. 2, 2023, pp. 405-439.

④ 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可以通过正式化、集中化、授权化等进行衡量,参见田野:《国际制度的形式选择:一个基于国家间交易成本的模型》,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第97—98页。

国试图通过这些合作机制,实现不同盟伴的力量聚合。一方面,目前大多数小多边机制表现为较低的制度化水平。有学者统计,在美国领导的13个亚太小多边机制中,只有四个表现出中等以上的制度化水平。^① 这些较低制度化水平的小多边机制能够降低国家间在特定领域开展合作的成本,在议题设置、成员选择与行动开展等方面提高合作效率与灵活性,从而实现对双边联盟关系的补充与强化。同时,合作机制的构建能够促进成员间沟通与信息交换,为美国提供更多影响盟伴政策、协调整体战略的渠道。另一方面,制度化水平越高,美国作为主导国对盟伴政策的影响力越强。^② 制度化水平较高的合作机制则有利于实现有约束力的承诺,提高国家背叛合作的成本。不容忽视的是,正式的条约联盟关系还对各类双边与小多边机制的形成具有“外溢”效果。双边联盟是亚太盟伴网络的核心支撑,美国以其为基础框架创建与升级各类小多边合作机制。双边联盟与各类小多边机制相互强化、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盟伴网络内国家间协调合作的运作平台。

第三,差异化的节点位置。美国在盟伴网络内的中心位置使其能够获取与发挥网络性权力,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③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高网络中心度的行为体拥有更高的权力地位与更多的资源。亚太地区的盟伴网络以美国为中心、以特定盟国为次中心,仍是一种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美国处于盟伴网络的中心节点位置,连接着多层次、多议题与多主体的网络单元。而不同的盟伴处于差异化的节点位置。盟伴体系在不同的合作

① Mason Richey and Olena Guseinova, “Disputed Geometries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US-China Perspectives on Minilateral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6, 2024, pp. 828-847.

② Geoffrey P. R. Wallace, “Alliances,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Military Strateg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5, No. 3, 2008, pp. 224-243.

③ 网络性权力是指“依托网络结构的不对称性控制节点及其连线的能力,具体包括节点的主导地位、连线的联系程度以及掌控节点及其连线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利用中心位置获取(access)资源与信息、作为中间人(brokerage)连接其他网络,以及威胁退出(exit options)网络是网络性权力的三个维度。参见任琳、孙振民:《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6期,第83—109页;Emilie Hafner-Burton, Miles Kahler and Alexander H. Montgomery,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3, No. 3, pp. 559-592.

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成员重叠”,即某一盟伴同时参与多个领域的双边或小多边合作。此类盟伴将在盟伴网络内拥有更高的中心度与更关键的节点位置,同美国和其他盟伴的联系更多、强度更高。例如,日本与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北锚”与“南锚”,不仅持续深化与美国的双边合作,而且积极参与多个美国创设的小多边合作机制。这使日澳两国逐渐成为区域性网络的主要节点,在加强与中心节点(美国)联系的同时,积极连接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在美国主导的盟伴网络内承担更多责任,而韩国、菲律宾与泰国则逐渐成为相对次要的外围节点。^①这种以美国为中心节点、各盟伴处于不同节点位置的圈层结构,有助于维持美国在地区安全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使美国能够调动、获取更多资源,对其他节点施加影响力,进一步动员与整合盟伴力量。

(三) 美国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的基本路径

美国通过哪些路径推动传统轴辐体系向盟伴网络转型?网络的基本构成有助于理解美国对亚太盟伴网络的构建路径。节点与描述节点之间关联性的联系是网络的两个基本部分。^②网络内的节点构成与节点间建立联系的议题领域,是美国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的两个基本维度。

盟伴网络建立在既有轴辐联盟网络的基础上,其节点构成较容易理解。在轴辐联盟网络内部包括美国与其条约盟国。在轴辐联盟网络外部,美国地区关系网络扩展的直接对象是区域内的关键伙伴。同时,美国是亚太与北约两大联盟体系的桥梁,地区关系网络扩展的对象还可能涉及区域外的分支盟国,即美国推动北约盟友向亚太地区投射力量,以融合对接两大不同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 Jae Jeok Park, “The US-led Security Network in the Indo-Pacific in International Order Transition: A South Korean Perspectiv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6, No. 2, 2023, pp. 329-350; Matteo Dia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he Rise of A Networked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No. 2, 2020, pp. 185-207; Nick Bisley, “The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Declaration and the Changing Regional Security Setting: Wheels, Webs and Beyond?”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2, No. 1, 2008, pp. 38-52.

② 戴维·诺克、杨松著,李兰译:《社会网络分析(第二版)》,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地理区域的联盟体系。此类不同分支联盟建立合作关系被称为“联盟联结”。^①

建立联系的议题领域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方面,传统联盟聚焦军事安全合作。军事联盟的核心是在特定条件下,向盟国履行关于军事支持的承诺。除此以外,联盟成员也会在平时进行广泛的军事协调与合作,具体包括各种类型的军事接触、统一指挥、共同防御政策、部队部署、军事援助与军事基地使用等不同制度化水平的军事合作形式。^② 这些军事协调与合作反映出联盟条约的深度。^③ 盟伴网络建立在传统联盟关系的基础上,军事安全合作是盟伴网络内各节点建立联系的主要领域。美国需要通过与盟伴开展军事安全合作,强化在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升威慑能力,并增强盟伴的防务能力与彼此之间的互操作性。一般而言,美国与盟国的安全合作水平要明显高于与伙伴国,不同盟国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水平也存在差异。

另一方面,由传统军事安全合作进行议题扩展,将契合美国战略需求的多元议题作为节点间建立联系的纽带。布雷特·利兹(Brett Ashley Leeds)等学者发现,冷战后,联盟在设计上越来越将安全承诺与其他议题领域的合作相结合。^④ 在设置联盟议程及其针对对象上,美国发挥主导作用,并将自身意志强加给盟友。^⑤ 界定“威胁”与选择议题是实现议题扩展的第一步,来自主导国美国的需求与塑造是特定议题成为节点间合作纽带的开端。例如,“9·11”事件后,应对恐怖主义成为美国与盟国强化合作的主要领域。而在大国竞争升级的背景下,美国通过政治化与安全化,将某些议题设定为

① 魏冰、刘丰:《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扩张的逻辑》,载《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5期,第38页。

② Brett Ashley Leeds and Sezi Anac, “Allianc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Alliance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31, No. 3, 2005, pp. 188-190; Benson and Clinton, “Assessing the Variation of Formal Military Alliances,” p. 873.

③ Joshua Alley, “Alliance Participation, Treaty Depth, and Military Spend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5, No. 4, 2021, pp. 929-943.

④ Brett Ashley Leeds and Michaela Mattes, “Alliance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Aberration, New World Order, or Continuation of Histor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4, No. 3, 2007, pp. 194-195.

⑤ 刘丰:《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6期,第30页。

受到竞争对手的挑战与威胁、需要完全确保本国竞争优势的议题。经贸、新兴与关键技术、供应链安全、关键矿产资源与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的竞争和安全属性凸显,逐渐成为网络内不同节点间建立联系的重要议题方向。

按照节点构成的对象与建立联系的议题领域两个维度,可以将美国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的基本路径分为四种类型(如图 1)。不同路径共同推动盟伴网络规模的扩大与密度的提升,且在该过程中发挥差异化作用。这种区分有助于理解美国亚太盟伴网络内不同层次的合作类型。

		节点构成	
		轴辐网络内部	轴辐网络外部
联系领域	军事安全议题	联盟内安全网络建设	联盟外安全网络扩展
	非军事的多元议题	联盟内议题网络建设	联盟外议题网络扩展

图 1 美国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的基本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一类路径是“联盟内安全网络建设”。这是整个盟伴网络构建最核心的部分,表现为美国围绕军事安全合作,巩固与条约盟国的双边安全关系,并加强不同盟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前者是在正式联盟条约的基础上,明确安全支持、增强威慑能力;后者则是试图在一系列非正式的国防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实现不同“辐条”间的联结。相应地,联盟内安全网络建设发挥两个核心功能:一是稳定联盟交换。联盟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① 为

① 参见 Snyder, *Aliance Politics*, p. 166;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 904-933; Yuen Foong Khong, “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6, No. 1, 2013, pp. 1-37; Tongfi Kim, *The Supply Side of Security: A Market Theory of Military Alliances*,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陈拯、王川:《自主性与安全的权衡:日美围绕冲绳问题交涉的演进》,载《东北亚论坛》,2023 年第 6 期,第 109—124 页。

获取盟国在特定议题上的支持、配合与资源投入,美国需要提供的关键产品是安全上的保障与承诺,而开展军事安全合作是美国明确安全保障的主要方式之一。美国安全保障的不可靠与盟国双边安全关系的“退化”,会影响盟国对美国各类政策议程的回应。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也面临“赞助者困境”,使其需要巧妙地设计安全支持的边界。二是弥补制度短板。在轴辐体系内,各辐条间安全关系的缺失是其制度设计的短板。理论上,国家更倾向同“朋友的朋友”建立联系,两方的共同盟友作为“中间人”,可以向两个盟友提供关于彼此合作意图与对双边行动潜在贡献的信息,调解两个分支盟友的矛盾,推动两国实现军事合作。^① 美国主导的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涵盖不同的盟国,这既使各盟国通过美国这一中心节点强化安全联系,也有助于盟国之间建立或升级双边性的安全合作机制,从而推动双边联盟体系的多边化。

第二类路径是“联盟内议题网络建设”。这表现为美国利用不对称联盟关系中议程设置的主导权,将契合自身战略需求的多元议题嵌入到联盟内部合作中,在美国与盟国、不同盟国之间建立不同议题的联系纽带。在某些议题上,盟国与美国的利益需求一致,其可以在配合美国联盟议程转变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但在某些议题上,盟国与美国的利益需求存在差异。此时美国需要通过言语说服、利益补偿、共识凝聚甚至强迫施压等方式,促使盟国配合与支持自身行动。联盟内议题网络建设对传统轴辐联盟网络进行了议题联系上的扩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传统联盟议程集中在军事安全领域,而议题网络建设扩展了传统双边联盟关系的任务范围,反映出美国需要在更广泛的外交层次发挥联盟的战略协调功能;其二,联盟内议题网络建设为增强不同盟国之间的横向联系提供新的平台。传统上,美国作为轴辐体系中的主导国为各盟国提供安全保障,而各盟国之间发展安全关

① 参见 Brandon J. Kinne, “Network Dynamics and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4, 2013, p. 769; Brandon J. Kinne,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Security Net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2, No. 4, 2018, pp. 799-837; Bomi K. Lee, “Triangles, Major Powers, and Rivalry Dur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7, No. 6, 2023, pp. 1128-1154.

系的动力极大受到其与美国双边安全联系强度的限制。^①多元合作议题的扩展有助于不同盟国根据自身利益需求,寻找新的合作切入点,建立新的联系纽带,相互塑造合作偏好。这些其他议题领域的合作也可能外溢到安全领域,为双方开展较为敏感的军事合作提供突破口。

以上两类路径聚焦亚太联盟内部,目标是以各类议题为纽带强化美国与盟国、不同盟国之间的联系,推动双边轴辐网络向多边联盟网络演进。相比之下,第三、四类路径分别表现为美国通过军事安全合作或非军事的多元议题,扩大轴辐联盟网络内部成员与地区伙伴、北约盟国等联盟外部国家的联系。其核心是将更多的力量主体吸纳进网络,扩大美国在地区的关系网络规模,并以不同的合作议题提升网络内的相互联系程度。联盟外安全与议题网络扩展形成新的伙伴关系机制网络,能够补充美国联盟体系内部合作,具体表现为三方面的作用。其一,弥补联盟内合作的封闭性,弱化美国地区关系网络的边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联盟网络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而联盟外安全与议题网络的灵活扩展淡化了盟友和伙伴的国家类型界限,以及亚太联盟与北约的地理空间界限,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网络在边界上具有模糊性与开放性。这种动态的边界特征始终服务于美国在特定时期的利益需求。其二,缓解联盟内合作的资源不足,实现有针对性的资源整合。对于美国来说,联盟内网络建设将资源的调动与传递限定在亚太条约盟国内。而以地区伙伴为对象的联盟外安全网络扩展,建立在美国提供区域安全预期的基础上,^②为美国介入或挑起亚太地区热点安全议题提供战略支点。以北约盟国为对象的联盟外安全网络扩展,有助于美国将不同地区盟国的战略资源以相对制度化的形式汇总,借助不同地区盟国的力量共同施压竞争对手。^③而联盟外议题网络扩展使美国能够针对不同议题领域

① Izumikawa, "Network Connec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Hub-and-Spokes Alliance System in East Asia," pp. 7-50.

② 相关研究可参见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 and Isaac B. Kardon, "Security without Exclusivity: Hybrid Alignment under U. S. -China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9, No. 3, 2025, pp. 122-163; 刘丰:《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第6—25页。

③ 魏冰:《大国竞争、联盟体系困境与美国亚欧联盟联结》,载《外交评论》,2024年第6期,第111页。

的特性,挑选与吸纳具有独特优势、资源或影响力的行为体,灵活地动员最广泛、具有针对性的力量。其三,推进条约盟国与地区伙伴的联结。通过联盟外安全和议题网络扩展,美国将不同的盟国与伙伴凝聚在自身主导的战略框架或合作机制下,这有助于实现盟伴之间的相互带动,^①为美国提供更多影响盟伴政策的渠道,并使美国发挥盟国的地区优势,通过盟国强化联盟体系与地区伙伴的合作。

总之,美国可以通过以上四种路径,实现对亚太盟伴网络的构建。在这一过程中,盟伴网络的结构特征逐渐形成。尽管盟伴之间开展的双边与小多边合作也源于自身的战略需求和自主,盟伴试图在配合美国行动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关系网络,获取安全或经济利益,但这更多处于美国的要求与“监督”下,美国在盟伴网络中的双边影响力反而得到增强^②。在鼓励盟伴间深化合作、设置具体合作议程、确立或升级双边和小多边合作机制,以及发起与协调对外行动等方面,美国起到主导作用,并通过说服、诱导甚至强迫等手段协调盟伴的立场与政策。^③因此,下文将重点讨论美国作为主导国如何通过四种基本路径,在亚太地区构建盟伴网络。

四、美国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的实践

基于上述类型化框架,可以考察美国不同政府在同一路径上政策实践的延续与变化。总的来看,从奥巴马到拜登政府,美国对亚太盟伴网络的重视与构建具有延续性,但不同政府具体采取的构建路径与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整体框架下,推动“美国+盟国+伙伴”合作网络的形成与强化,重点是以传统安全议题为导向,在美国与盟国、不同盟国之间构建紧密充实的联盟安全网络,并增强亚太联盟体系与地区

① 例如,“借盟强伴”与“以伴带盟”。参见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第37页。

② Ping-Kuei Chen, “The Prospects of the U. 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Managing from the Hub,” *Issues & Studies*, Vol. 56, No. 3, 2020, p. 19.

③ 参见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90页;凌胜利:《联盟管理:概念、机制与议题——兼论美国亚太联盟管理与中国的应对》,载《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第18—19页。

伙伴的安全互动,在涉及盟国与伙伴的议题网络建设方面进展相对有限。特朗普第一任期更加强调自我力量建设,对待联盟持“交易主义”态度,这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受到一定冲击,但其试图构建“有侧重的盟伴网络”,即在联盟内安全网络上有选择地强化盟国间关系,同时继续扩展与地区伙伴的安全合作,更加注重以小多边机制联结特定的盟国与伙伴,并初步将美国在大国竞争中关切的核心议题,例如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嵌入到盟伴网络的构建中。拜登政府对亚太盟伴网络的构建则是一个更加精细的“系统工程”,其基于四种路径比较全方位地设计与布局盟伴网络,寻求以传统安全议题和关键技术、供应链、关键矿产资源、基建等契合美国战略需求的多元议题,在亚太联盟内部的美国与盟国、不同盟国之间,以及亚太联盟与地区伙伴、北约盟国之间建立起多层次的紧密联系。

(一) 联盟内安全网络建设

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通过以升级双边联盟关系为基础、以协调盟国间安全合作为补充,推动亚太地区紧密联盟网络的形成与强化,以此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与影响力。在双边联盟关系上,奥巴马政府通过深化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增强对盟国的安全承诺,试图实现对盟国的安抚,强化联盟威慑的可靠性,促使盟国承担更多责任。^①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日、美澳、美韩与美菲基于联盟关系的双边安全合作均呈现巩固升级。例如,美韩与美日联盟呈现“同步强化”的态势。^② 美日经过近3年的修订工作,于2015年正式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意在调整两国分工,扩展两国安全合作的空间、领域与形式。而美韩两国借助朝核问题不断升级防务合作,多次开展大规模联合军演。2010年,美韩两国举行首次外长与防长“2+2”会谈。奥巴马政府还首次将美韩联盟定位为太平洋地区安全的“核心轴”,两国相继签署《战略同盟2015》《国防合作指南》与《战略计划指南》等合

① 左希迎:《亚太联盟转型与美国的双重再保证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59—81页。

② 张威威:《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同步强化及其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3期,第1—12页。

作文件。^① 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军事部署中的地位也日益提升,美澳军事协作逐渐强化。2011年,美国宣布海军陆战队将在澳北部达尔文基地轮换部署,这是美国首次在澳正式驻军。2014年,美澳签署为期25年的《军力态势协议》(Force Posture Agreement)。

双边联盟关系的强化为美国主导推动各类三边安全合作提供支撑。奥巴马政府力图发挥“召集者”作用,协调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盟国之间建立与强化制度化联系,弥补轴辐体系的制度短板。以美日韩、美日澳为代表的“美日+”三边安全合作取得进展。2009年美日韩三国举行首次防长会晤,并于2012年宣布实现三边防长会晤定期化。2014年,美日韩三国签署《美日韩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日韩两国通过美国共享军事情报,进一步提升了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机制化水平。美日澳三边合作以“三边战略对话”为主要机制,这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首个连接两大盟友的正式三边安全机制。2013年与2016年的第五、六次三边战略对话发表涉及东海、南海问题的联合声明。三国也多次共同开展联合军演,例如澳大利亚2012年首次参与美日“对抗北方”联合军演,日本2015年首次参加美澳“护身军刀”联合军演。美日澳三边安全关系的强化嵌套着日澳横向安全合作的升级。自2007年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日澳安保联合宣言》以来,两国在军事演习、情报互享、地区安全事务协调、防卫技术与国防装备等方面不断强化合作,朝着“同盟化”关系的方向发展。^②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安全网络建设处于“特朗普冲击”的阴影下。相比于奥巴马政府重视通过双边与三边安全合作,不断充实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网络,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的外交原则,基于“交易主义”的态度,要求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驻军费用的成本分担与经贸问题,成为冲击美国与亚太盟国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美国与亚太盟国的分歧摩擦加剧了盟国对联盟关系可靠性的质疑,也削弱了美国对

① 李婷婷:《构建亚太“核心轴”:美韩同盟的安全合作转型》,载《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2期,第36—37页。

② 参见朱海燕:《日澳关系“同盟化”的新发展及其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8期,第44—51页;凌胜利、侯聪睿:《地区安全秩序重塑与日澳安全合作》,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5期,第56—73页。

盟国的战略动员能力,迫使美国更多依赖自我。^①然而,特朗普政府仍然对亚太盟国进行战略再保证,^②明确美国的安全承诺或战略支持。例如,美国多次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确认为韩国提供核保护伞,并首次在南海问题上公开确认对菲律宾的保护承诺。美国与亚太盟国的双边安全合作整体上也在继续巩固与扩展。这使得亚太地区双边联盟关系的弱化相对有限。^③

同时,特朗普政府也试图在不同盟国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三边安全框架,重点表现为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的扩大、深化与制度化。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逐渐定期化,于2017至2019年连续三年举行,就海上安全、朝核、反恐等地区安全问题进行沟通协调。这有助于安抚焦虑的盟国,促使特朗普政府继续密切参与亚太事务,^④并为日澳两国强化安全联系提供机制性平台。日澳横向安全联系的强化既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推动,也源于两国在双边联盟关系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均担心被美国抛弃^⑤。相比于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的强化,美日韩三边安全关系进展有限甚至萎缩。美国持续的鼓励与支持是日韩两国处理分歧的主要外部推动力。^⑥而相比于前任政府,特朗普政府对介入和管理日韩冲突兴趣不大,日韩双边关系的恶化削弱了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美国主导与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的

① 凌胜利:《“特朗普冲击”与亚太地区秩序调整》,载《和平与发展》,2019年第4期,第4—5页。

② 左希迎:《特朗普政府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第57—58页。

③ 参见周建仁:《战略信誉、同盟结构与同盟弱化》,第1—50页。

④ Andrew Shearer, “U. S.-Japan-Australia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the Trump Era: Moving from Aspiration to Action,” in Daljit Singh and Malcolm Cook,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17*, Singapor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7, p. 96.

⑤ 相关研究可参见 Tomohiko Satake and John Hemmings,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ntex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4, 2018, pp. 815-834; Thomas S. Wilkins, “After A Decade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Japan and Australia ‘Decentering’ from the US Allianc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1, No. 4, 2018, pp. 498-514.

⑥ Abraham M. Denmark, *U. S. Strategy in the Asian Century: Empowering Allies and Partn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144.

成本逐渐提高。^①

拜登政府对亚太联盟安全网络的设计更加具有主动性与系统性。相比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将联盟关系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为充分发挥盟国作用,拜登一上台便明确亚太盟国的重要地位,重申对日韩菲等盟国的联盟承诺。同时,拜登政府通过升级与增设海外军事基地、增派军力与武器部署等方式,提升与亚太盟国的军事协同水平,增强联盟威慑力,重新确立盟国对联盟可靠性的信心。在美菲全面恢复《访问部队协议》并加速实施《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背景下,菲律宾宣布再向美军开放4个军事基地。^②2024年,美军以演习为由,首次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部署“堤丰”中程导弹系统。美国也更加重视澳大利亚在地区军事布局中的“桥头堡”作用。拜登政府计划出资扩建澳北部的廷达尔空军基地,部署具有核打击能力的B-52轰炸机,同时宣布将增加在澳的海陆空部队轮换。^③2023年7月,澳大利亚宣布允许美国升级和扩大其北部4处空军基地,美军潜艇可更频繁、更长时间地访问澳西部的斯特灵海军基地,双方还在太空合作、部队轮换与情报共享等方面达成合作。^④

① Muhui Zhang, “What Makes Good Trilateralism? Theorizing the Utilities of Trilateralism in East Asia,” *Pacific Focus*, Vol. 35, No. 3, 2020, p. 450-453; 姚寰宇:《美国在日韩冲突中的联盟管理策略》,载《世界政治研究》,2024年第2期,第149—154页。

② U. S. Department of Defence, “Philippines, U. S. Announce Locations of Four New EDCA Sites,” April 3, 2023, <https://www.war.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349257/philippines-us-announce-locations-of-four-new-edca-sites/>, 访问时间:2024年4月12日。

③ Australian Minister for Defence, “Joint Statement on Australia-U. S.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AUSMIN) 2022,” December 7, 2022, <https://www.minister.defence.gov.au/statements/2022-12-07/joint-statement-australia-us-ministerial-consultations-ausmin-2022>, 访问时间:2024年1月12日; Angus Grigg, Lesley Robinson and Meghna Bali, “US Air Force to Deploy Nuclear-capable B-52 Bombers to Australia as Tensions with China Grow,” ABC News, October 31, 2022, <https://www.abc.net.au/news/2022-10-31/china-tensions-taiwan-us-military-deploy-bombers-to-australia/101585380>, 访问时间:2024年4月12日。

④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Statement on Australia-U. S.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AUSMIN) 2023,” July 29,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476104/joint-statement-on-australia-us-ministerial-consultations-ausmin-2023/>, 访问时间:2024年4月12日。

此外,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美日澳、美日韩、美日菲与美日澳菲等小多边安全合作以美国为中心、以美日为主线,加速实现相互嵌套与联结。这推动了双边联盟体系的多边化,使美国构建的联盟安全网络更加全面紧密。其中,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与日澳双边安全合作,是加强盟国间安全关系建设的核心。日本正式把澳大利亚列入“武器等防护对象”^①。2022年,两国签署所谓“历史性”的《互惠准入协定》,该协议通过消除或简化法律程序与后勤障碍,提高两国军队的互操作性与进入对方领土、依托对方军事设施开展行动的便捷性,标志着日澳“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升级。^② 2022年10月,日澳签署新的《安保合作共同宣言》,以此作为未来十年双方防务合作的指南。除了在联合军演、部队互访、情报共享、国防技术合作与装备转让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日澳两国还多次围绕南海、东海、缅甸与朝核等地区安全议题发表共同声明,2021年6月的“2+2”会谈更是首次提及台海。^③

韩国、菲律宾等盟国也寻求与日本、澳大利亚建立更加紧密的横向安全联系。拜登政府时期,美日韩三边防务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重视通过机制化建设、价值观软性约束、利益协调与劝说施压等手段,推动韩日管控分歧、深化合作,弥补东北亚小多边机制的缺口。^④ 2023年8月,美韩日三国领导人在戴维营举行大型国际峰会之外的首次会晤,三方宣布将年度领导人会议机制化,设立外长、防长的年度三边会晤,启动年度三边印太对话;进一步将防务合作机制化;建立三边海洋合作

①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Ninth Japan-Australia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2+2’),” June 9, 2021,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6e_000297.html, 访问时间:2024年4月13日。

② Thomas Wilkins, “Another Piece in the Jigsaw: Australia and Japan Sign Long-Awaited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anuary 20, 2022,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another-piece-jigsaw-australia-japan-sign-long-awaited-reciprocal-access-agreement/>,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5日。

③ Australia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Ninth Japan-Australia 2+2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June 9, 2021,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marise-payne/media-release/ninth-japan-australia-22-foreign-and-defence-ministerial-consultations>,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9日。

④ 凌胜利:《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强化及其前景》,载《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4期,第52—53页。

机制等。^① 前白宫亚洲事务高级官员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认为,此次峰会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组建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来在亚洲最重要的“权力游戏”。^②

美菲防务合作也呈现“美菲+”的趋势。聚焦南海问题,美国正在推动菲律宾与日澳等盟国构建相互交织的双边、小多边防务合作关系,促使盟国之间强化互助,调动盟国力量共同提升菲律宾的海上安保能力。2022年,继日菲两国正式建立“2+2”对话机制,美日菲举行首次三边防务政策对话,三国决定在海上安全、海域感知等领域开展合作,并建立定期会晤机制。2023年6月,美日菲三国在南海举行首次海上演习,澳大利亚则作为观察员加入。^③ 日本还首次使用“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框架向菲提供海岸监视雷达系统。^④ 2024年,日菲两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简化两国部队和武器进入对方国家的入境程序。在双边与三边防务合作的基础上,美日澳菲四边防务合作也逐步升级。2023年6月,四国在新加坡举行首次四方防长会谈,同意加强安全合作,并就南海联合巡航交换意见。2024年4月,四国在南海以“海上合作活动”为名义开展联合演习,重点进行了反潜战等实战化课目演练。^⑤

①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The Trilateral Leaders’ Summit at Camp David,” August 18, 202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8/18/fact-sheet-the-trilateral-leaders-summit-at-camp-david/>, 访问时间:2025年3月7日。

② “Camp David Pact Eases Japan-South Korea Tensions,” *Financial Times*, August 19, 2023, <https://www.ft.com/content/1e1652d5-452c-48fc-b726-1251b707c8e6>,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6日。

③ “Philippines, U. S., Japan to Hold First-Ever Joint Coast Guard Exercise,” *U. S. News*, May 29, 2023, <https://www.usnews.com/news/world/articles/2023-05-29/philippines-u-s-japan-to-hold-first-ever-joint-coast-guard-exercise>,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日。

④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Signing and Exchange of Notes for 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 to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November 3, 2023,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4e_003330.html,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2日。

⑤ Jim Gomez, “US, Japan, Australia and the Philippines to Stage Military Drills in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April 6, 2024, <https://apnews.com/article/south-china-sea-united-states-japan-philippines-6f2c83d4157d9c8902d161ba2b23075a>,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2日。

(二) 联盟内议题网络建设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联盟网络的合作升级主要针对军事安全领域,在地区议题的政策协调上主要围绕南海、东海、朝核与反恐等,向非军事安全议题的扩展相对有限。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经济安全与科技安全成为美国在大国竞争中关切的重要议题。为满足自身战略需求,美国初步推动亚太联盟网络内的合作向“泛安全”的多元议题扩展,重点围绕能源与基础设施等议题,动员日本、澳大利亚等特定盟国的力量。特朗普政府发起“美日战略能源伙伴关系”(Japan-U. S. Strategic Energy Partnership)与“美澳能源战略伙伴关系”(United States-Austral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on Energy),深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能源合作。^① 2018年,美日澳三国宣布建立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2019年,美日澳三国联合发起“蓝点网络”计划(Blue Dot Network, BDN),试图整合美国与盟国在“印太”地区的已有基建项目,将基建合作嵌入到联盟网络中。^② 2019年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也强调加强三国基建合作。由于特朗普政府相对不重视联盟关系,在关键技术等领域更多采取“松散联盟”的单打独斗形式,^③而不热衷于与更多盟国在多元议题上开展紧密协调,美国战略动员能力的削弱也影响了盟国对美国政策议程的积极回应。

相比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更加重视在美国需要的多元议题领域内,动员与整合地区盟国力量,以双边或小多边机制主导构建紧密协调的联盟内议题网络。美国对关键技术、供应链、关键矿产资源与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的安全化与政治化更为明显,这些议题成为拜登政府拓展联盟网络合作纽带的主要方向。一方面,拜登政府不断扩充传统联盟合作的议题领域,寻求为双边军事联盟增加“技术联盟”“供应链联盟”“矿产联盟”等新的功能内

① 仇朝兵:《澳日印美“印太战略”的形成——从战略概念到战略实践的演进》,载《南洋问题研究》,2023年第1期,第14—15页。

② 毛维准、戴菁菁:《对冲“一带一路”:美国海外基建“蓝点网络”计划》,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5期,第55—75页。

③ 余南平、戢仕铭:《西方“技术联盟”组建的战略背景、目标与困境》,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期,第48页。

涵。由于日本在半导体设计、设备生产环节的技术优势,美国重点联合日本在信息设备领域加强对华封锁。^① 2021年,美日双方领导人承诺在5G网络、通信技术全球标准制定、半导体供应链、量子科技与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合作,两国共同投资研发下一代通信技术,并启动“全球数字互联互通伙伴关系”。^② 美日“2+2”会谈多次强调要确保并提高联盟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重申加强技术合作和联合投资。2023年,美日两国签署关于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协议,确立两国针对电动汽车电池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合作领域。^③ 在2021年5月的美韩峰会上,美韩两国承诺加强在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的伙伴关系。2023年,尹锡悦访美期间多次强调打造“尖端技术联盟”,双方领导人重申在关键技术领域建立互惠互利供应链的重要性,决定设立“韩美下一代核心技术与新兴技术对话”机制,商定在尖端产业供应链方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被韩国官方称为此次尹锡悦访美的最大成果之一。^④ 拜登政府还与澳大利亚签署《澳大利亚与美国气候、关键矿产与清洁能源转型契约》(Australia-United States Climate, Critical Minerals and Clean Energy Transformation Compact),提出在清洁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新兴电池技术等领域加强合作。^⑤ 2023年,美澳宣布建立“创新联盟”(Innovation Alliance),宣称促进先进技术和太空合作,提高清洁能源供应链

① 韩召颖、李圣达:《美日技术联盟的发展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6期,第28页。

②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 S.-Japan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CoRe) Partnership,” April 16, 2021,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fact-sheet-u-s-japan-competitiveness-and-resilience-core-partnership/>,访问时间:2024年3月18日。

③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gn Critical Minerals Agreement,” March 28, 2023,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3/march/united-states-and-japan-sign-critical-minerals-agreement>,访问时间:2024年3月18日。

④ 《韩政府:尹锡悦访美奠定韩美芯片同盟基础》,韩联社,2023年4月30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230430001800881>,访问时间:2024年3月18日。

⑤ The White House, “Australia-United States Climate, Critical Minerals and Clean Energy Transformation Compact,” May 20, 202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20/australia-united-states-climate-critical-minerals-and-clean-energy-transformation-compact/>,访问时间:2024年4月19日。

弹性和透明度,实现负责任、可持续和稳定的关键矿产供应。^①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试图将经济与技术安全合作嵌入到与亚太盟国的小多边机制中。这既契合美国的战略需求,也有助于不同盟国通过美国这一中心节点,在自身关切的议题领域实现针对性合作。例如,美日韩三边合作逐渐向关键技术、供应链与经济安全等领域延伸。2021年,三国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举行三边会晤,强调确保半导体供应链安全。三国在戴维营会晤后,宣布进一步围绕供应链弹性、先进技术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援助与关键矿产等方面深化合作,同时启动供应链早期预警系统,加强颠覆性技术保护与技术标准合作等。2023年3月,美日韩三国举行首次经济安全三边对话,表示围绕量子与空间技术、半导体、新能源电池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弹性等加强合作。这些三边合作顺应了日韩两国对经济安全的重点关切,成为两国关系改善升级的突破口与粘合剂,促成日韩建立“新经济伙伴关系”。^②两国时隔8年于2023年12月重启“日韩高层经济对话”,就经济安全政策和“经济威压”等加强沟通协商,并强调在其他经济安全小多边、多边协商机制中保持紧密合作。

(三) 联盟外安全网络扩展

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但该战略并非是一项新政策,而是对先前承诺的深化与扩大,表明美国明确将亚洲提升到全球区域战略的优先地位。^③在亚太战略的整体规划下,美国寻求重组在亚太地区的关系网络,具体表现为在强化联盟内网络的基础上,推动形成“美国+盟国+伙伴”的合作网络。一方面,奥巴马政府推动伙伴关系的多样化,弥补轴辐体系的成员残缺与对外封闭,寻求提升美国对亚太政治安全秩序的支配力,增加美国可利用的战

①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Delivering o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 with Australia,” October 25,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10/25/fact-sheet-delivering-on-the-next-generation-of-innovation-and-partnership-with-australia/>, 访问时间:2024年3月21日。

② 王生、李游:《韩国尹锡悦政府经济安全战略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6期,第75页。

③ David Shambaugh, “Assessing the US ‘Pivot’ to Asia,”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7, No. 2, 2013, pp. 10-19.

略资源。美国与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重点伙伴的安全联动巩固升级。例如,在南海问题升温的背景下,美越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越南成为美国实施“楔子战略”,平衡中国在南海军事优势的重要支点。^① 美越两国相继签署《美越防务合作备忘录》《美越防务关系联合愿景声明》等协议,稳步推进航运安全、海上执法能力等防务合作。继 2013 年美越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后,奥巴马政府逐步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同时,奥巴马政府积极接触缅甸、柬埔寨与老挝等国,寻求补齐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短板。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试图发挥关键盟国的地区优势,鼓励盟国与伙伴加强横向联系,推动盟伴在美国关心的安全议题上开展政策协调,从而逐步充实美国主导的亚太盟伴网络。例如,日本积极发挥亚太安全格局的“次轴心”作用,配合和参与美国对亚太关键伙伴的拉拢,与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重点伙伴强化双边安全合作,并基于美日协同的框架逐渐发展与印度的三边安全合作。^② 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强调与中国接触,其联盟外安全网络扩展一定程度上也寻求将中国纳入其中。

特朗普执政后,“印太”概念逐渐取代“亚太”概念。在将中国明确设定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强调盟友与伙伴是任何竞争对手都无法比拟的持久、不对称和独特优势,将强化美国的盟伴关系发展为一个网络安全架构,并认为这种盟伴网络是“印太”地区稳定与和平的核心。^③ 美国继续强化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重点伙伴的双边安全合作,并更加注重短期的实用利益,以南海等自身关注的特定安全议题为导向,增强与地区伙伴的协调合作。特朗普政府还更加重视通过小多边方式联结盟国与伙伴,美国亚太盟伴网络最显著的拓展就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 Quad)的重启。Quad 是特朗

① 信强:《美越安全合作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66—68 页。

② 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4 期,第 48—51 页。

③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U. S. Department of States, November 3, 2019, p. 7, <https://2021-2025.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Open-Indo-Pacific-4Nov2019.pdf>,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3 日。

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旨在拉拢关键盟伴,实现与中国对抗的目标。^① 作为 Quad 的重要成员,印度逐渐由美国的伙伴国升级为“准盟友”,不仅与美日澳存在直接的四边防务联系,而且巩固升级与三国的双边、三边防务合作,开展了较为频繁的军事演习、战略对话、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等。叠加嵌套与相互补充的双边、三边与四边合作,导致 Quad 在性质上更像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网络”。^②

拜登上台后,美国更加系统性地推动联盟体系扩展为盟伴网络,明确强调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伴是最重要的战略资产,^③通过打通盟国与伙伴国的界限,实现对华“一体化威慑”。2021年8月,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表示,“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是美国的优先考虑,美国将投入时间和精力强化关键伙伴关系”。^④ 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太平洋岛国等被拜登政府视为主要的区域合作伙伴。^⑤ 美国大力加强与这些关键伙伴国的双边防务合作,试图构建对华竞争的统一战线。还以美越关系为例,拜登政府开始向越南提供空军训练体系,并将向越南移交第三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⑥

① 刘阿明:《“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及前景探析》,载《国际展望》,2021年第1期,第92—95页。

② Thomas S. Wilkins, “The Quad process: The Evolution of Diplomatic and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Indo Pacific,” The Japan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cember 17, 2019, pp. 3-4.

③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9日。

④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Harris 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ugust 24, 2021,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8/24/remarks-by-vice-president-harris-on-the-indo-pacific-region/>,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9日。

⑤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9日。

⑥ U. S. Mission Vietnam, “United States Expands U. S. -Vietnam Defense Cooperation with Delivery of T-6C Trainer Aircraft,” November 20, 2024, <https://vn.usembassy.gov/united-states-expands-u-s-vietnam-defense-cooperation-with-delivery-of-t-6c-trainer-aircraft/>, 访问时间:2025年1月3日; Minh Vu, “US to Transfer 3rd Patrol Ship to Vietnam,” *Hanoi Times*, April 21, 2022, <https://hanoitimes.vn/us-to-transfer-3rd-patrol-ship-to-vietnam.586555.html>, 访问时间:2025年1月3日。

2023年6月,美国航母三年来首次到访越南。^①同年,美越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计划深化执法、安全与情报合作,建立相关安全对话机制。除了与亚太伙伴国进行直接的防务合作,拜登政府也进一步调动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区盟国深化与关键伙伴的横向防务联系。例如,美日两国强调通过联合培训、能力建设与防卫装备转让等方式,促进与东南亚、太平洋岛国合作伙伴的安全合作。^②日本相继与印尼、越南和新加坡签署《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让协定》,推动对东南亚国家的武器装备与技术转让。2023年至2024年,日澳两国与越南的双边关系相继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认加强海上安全等防务合作。拜登政府也重视发挥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优势,借助美澳关系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军事合作、提高互操作性,^③从而降低美国的资源投入。为配合美国行动、巩固自身地区优势,澳大利亚强调采取行动重建其作为太平洋地区“首选合作伙伴”的地位。^④

拜登还在特朗普政府“Quad 2.0”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精心设计与重新布局,推动美国、盟国与伙伴国之间嵌套式合作的制度化。继美印、日印实现“2+2”对话后,2021年9月澳印两国也举行首次“2+2”对话,与美日印、日澳印三边对话机制相互补充,加强了印度这一关键战略伙伴与三国的防务协调。在此基础上,美日印澳四国在Quad机制下围绕军事安全尤其是海上

① U. S. Mission Vietnam, “USS Ronald Reagan Carrier Strike Group Visites Vietnam,” June 25, 2023, <https://vn.usembassy.gov/uss-ronald-reagan-carrier-strike-group-visits-vietnam/>,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28日。

②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2023 U. S. -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January 11, 2023,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265559/joint-statement-of-the-2023-us-japan-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22/>,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5日。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on Australia-U. S.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AUSMIN) 2024,” August 7, 2024, <https://www.foreignminister.gov.au/minister/penny-wong/media-release/joint-statement-australia-us-ministerial-consultations-ausmin-2024>,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6日。

④ “Penny Wong Laments Australia’s ‘Lost Decade’ in Pacific as China Reportedly Seeks New Regional Deal,” SBS News, May 25, 2022, <https://www.sbs.com.au/news/article/penny-wong-laments-australias-lost-decade-in-pacific-as-china-reportedly-seeks-new-regional-deal/6altm55sg>,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0日。

安全,进一步开展具有实质性内容的行动。在理念目标上,Quad 被打造为具有明确的中国指向,意在将中国限制在第一岛链以内。^① 美日澳印四国协调生成共同的地区秩序愿景,强调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与基于规则的秩序”,承诺支持航行和飞越自由,反对所谓的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试图以“同一个声音”应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主张与行动,并提供地区海洋“公共产品”。^② 在具体行动上,Quad 着力强化四方防务合作,提高互联互通互操作水平与一体化作战能力,频繁开展战略对话与联合军事演习。例如,2021 年到 2024 年,四国先后在菲律宾海和孟加拉湾、东海、南太平洋以及孟加拉湾开展联合年度海军演习。基于与日澳印三国较为成熟的双边情报合作机制,拜登政府还打造 Quad 下的多边情报共享机制。四国宣布成立“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旨在构建针对中国海洋活动的情报信息网络,通过信息共享调动区域内国家跟随“印太战略”的积极性。^③

除了深化亚太联盟与关键伙伴的军事安全互动,相比于前两任政府,拜登政府更加明显地推动北约盟友向亚太地区投射力量,促成亚太—北约两大联盟体系的跨区域安全联动。美国是亚太—北约跨区域联动的中心节点。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印太战略报告》等文件明确提出,美国要继续整合两大区域的联盟体系,在“印太”与欧洲—大西洋之间建立“桥梁”,通过集体行动推动共同议程。^④ 不同地理区域的盟友通过美国主

① 马博:《霸权的衰落与小多边主义的崛起——以美国构建“四方安全对话”为例》,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35 页。

② Zongyou Wei, “The Evolution of the ‘QUAD’: Driving Forces, Impacts, and Prospects,”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 4, 2022, p. 293.

③ 胡波:《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计划与南海局势》,“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SCSPI),2023 年 2 月 25 日, <https://www.scspi.org/zh/dtfx/1677319583>, 访问时间:2024 年 1 月 31 日。

④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29 日;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29 日。

导建立的小多边安全机制,实现了资源的共享与传递。例如,2021 年美英澳三国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向澳大利亚输出核潜艇建造技术与能力。2023 年,三国公布核潜艇项目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向澳出售核潜艇、三方合作研制新型核潜艇 SSN-AUKUS。除了赋能澳大利亚核潜艇能力,三国还将共同发展先进军事能力作为 AUKUS 第二支柱,在海底能力、高超音速和反高超能力、电子战、国防创新与信息共享等尖端军事技术领域协调各自资源。^①

日本、韩国与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是直接对接北约的重要支点。北约将日韩澳与新西兰四国列为在亚太地区的四大伙伴国。在密集频繁且诸多具有“首创性”的高层互动下,四国与北约在防务合作机制建设、联合军演、情报共享、国防技术与军事装备等方面的合作持续强化。例如,2023 年日本与英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英国成为第一个与日本签署此类协议的欧洲国家。日韩两国分别与北约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Individually Tailored Partnership Programme,简称 ITPP)。ITPP 本质上更具功能性,聚焦于实际行动与技术合作,包括军备控制与核扩散、网络防御、军事互操作性等,这将增加北约与亚太四国的集体合作,双边 ITPP 的签署也会提高亚太四国之间的互操作性。^②

(四) 联盟外议题网络扩展

奥巴马政府聚焦经贸问题,推动签署排除中国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 TPP),将其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国基于安全获益的考量,强调 TPP 具有战略意义,意在通过构建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的经贸网络,强化安全

①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Implementation of the Australia-United Kingdom-United States Partnership (AUKUS),” April 5, 2022,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4/05/fact-sheet-implementation-of-the-australia-united-kingdom-united-states-partnership-aukus/>,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3 日。

② Hae-Won Jun, “NATO and Its Indo-Pacific Partners Choose Practice over Rhetoric in 2023,” RUSI, December 5, 2023, <https://www.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nato-and-its-indo-pacific-partners-choose-practice-over-rhetoric-2023>, 访问时间:2024 年 4 月 10 日。

联盟体系、抗衡中国经济影响力。^①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则更加倚重小多边方式,重点通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下的三边或四边协调,实现对经济议题的安全化建构,推动盟伴网络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低政治”议题扩展。例如,四方会晤的议程设置逐步纳入发展融资、互联互通与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② 特朗普政府寻求构建“印太”地区的基建平台,试图与日澳印三国建立地区性基础设施建设倡议;2018年美日印等国达成协议,确定在“印太”地区联合开发基础设施;美国也积极拓展“蓝点网络”计划的合作伙伴,试图在日澳两个初始参与国之外吸纳更多的伙伴国家,将其打造为一种俱乐部跨国网络。^③

相比于前两任政府,拜登政府试图在议题纽带、力量动员、机制创建与升级等多个方面,系统性地推动盟国与伙伴议题网络的扩展。针对关键技术、供应链、矿产资源与基础设施建设等不同议题领域的特性,美国在战略力量的挑选运用上呈现“梯次化”特征,^④重点整合具有独特优势或影响力的亚太伙伴国。拜登政府通过扩展与这些关键伙伴的双边合作,以及建立和升级盟伴小多边机制,将大国竞争背景下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多元议题,紧密地嵌入到盟伴网络的构建中。例如,在与特定伙伴的双边议题合作上,拜登政府强调马来西亚、越南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封装与测试环节的优势。2022年,美国与马来西亚签署《半导体供应链弹性合作备忘录》,强调共同建立弹性、安全与可持续的半导体供应链。^⑤ 2023年,拜登政府宣布与越南建

① 赵明昊:《“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取向》,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第124页。

② 曹鹏鹏:《“印太”视域下小多边安全合作的联盟管理——以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为例》,载《南亚研究季刊》,2022年第3期,第9页。

③ 毛维准:《美国的印太基建攻势:演变、逻辑与局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86—90页。

④ 刘锦:《拜登政府对华科技战略的梯次化特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1期,第68—70页。

⑤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Joint Press Release: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Malaysian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Sign Memorandum of Cooperation to Strengthen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Resiliency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Growth,” May 11, 2022,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5/joint-press-release-us-department-commerce-and-malaysian-ministry>,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8日。

立新的半导体合作伙伴关系,启动“劳动力发展倡议”与“电子和先进技术进步伙伴关系”,深化两国半导体供应链合作。^①同时,印度尼西亚在镍、钴等关键矿产供应链中具有优势,印尼时任总统佐科 2023 年访美期间,两国强调进一步加强在关键矿产资源与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合作。拜登政府还将印度视为“值得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②2023 年 1 月,美印正式启动“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扩大双方在顶尖技术领域的合作。6 月,莫迪访美期间,美印双方签署涉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半导体制造和关键矿产等一系列合作协议。^③

此外,拜登政府积极构建涵盖亚太盟国与关键伙伴的小多边议题合作机制,以此进一步加强盟伴之间的政策联动。贸易是拜登政府在亚太地区的最薄弱部分,缺乏真正的地区经济战略限制了美国开展战略合作的深度。^④2022 年,拜登政府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简称 IPEF),成员覆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越南、印度、印尼等 14 个国家。IPEF 涉及贸易、供应链、清洁经济与公平经济四大支柱,美国试图以此补充“印太战略”的经济短板。IPEF 成员国还共同提出“关键矿产对话”,寻求在成员内部建立起“稳定、安全”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对亚太地区已有的盟伴小多边机制进行议题扩容,同样是拜登政府构

①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Joseph R. Biden and General Secretary Nguyen Phu Trong Announce the U. S.-Vietnam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September 10, 202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9/10/fact-sheet-president-joseph-r-biden-and-general-secretary-nguyen-phu-trong-announce-the-u-s-vietnam-comprehensive-strategic-partnership/>,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0 日。

② 邢瑞利:《地位寻求、角色塑造与印度应对中美科技竞争的逻辑》,载《外交评论》,2024 年第 1 期,第 76 页。

③ The White House, “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June 22, 2023,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6/22/joint-statement-from-the-united-states-and-india/>,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0 日。

④ Alice Nason, “US Indo-Pacific Allies and Partners Must Remain in the Spotlight,”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ebruary 8, 2024, <https://gija.georgetown.edu/2024/02/08/us-indo-pacific-allies-and-partners-must-remain-in-the-spotlight/>, 访问时间:2025 年 3 月 11 日; Derek Grossman, “America’s Indo-Pacific Alliances Are Astonishingly Strong,”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5, 2023.

建多层次亚太盟伴网络的主要举措。例如,拜登上台后将自身关注的气候和清洁能源、外太空、基础设施建设、供应链安全与关键技术等议题纳入Quad的合作范围,并在各议题领域内建立相应的专家工作组与合作机制,促进各方开展实质性行动。

拜登政府还推动亚太盟国与北约盟国的议题合作,构建以自身为中心节点的跨区域议题联盟,这进一步模糊了亚太盟伴网络的地理范围。在供应链方面,美国与欧盟、英国、法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18个经济体召开“供应链部长级论坛”,提出遵循透明度、多元化、安全性与可持续性的全球供应链合作原则,建设集体的、长期的与有韧性的供应链。^① 2023年1月,美国、荷兰和日本三国达成协议,共同对中国实施先进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② 2023年下半年起,美国对韩国在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上的施压力度也愈发增强。^③ 在基建方面,拜登上台后重启沉寂一年多的“蓝点网络”计划,并在美日澳三国的支持下召开由经合组织主持“蓝点网络”认证咨询会议。以该计划为基础,七国领导人宣布启动“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简称B3W)。在第48届G7峰会上,七国领导人宣布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简称PGII),拜登政府宣称在未来5年内投入2000亿美元用于全球基础设施项目。该计划的四个优先投资领域与B3W基本相同,被视为其“重新包装版”。^④ 相比于“蓝点网络”,拜登政府新启动的B3W与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on Cooperation on Global Supply Chains,” July 20, 2022, <https://2021-2025.state.gov/supply-chain-ministerial-joint-statement/>, 访问时间:2024年2月14日。

② Alexandra Alper and David Shepardson, “U. S. Official Acknowledges Japan, Netherlands Deal to Curb Chipmaking Exports to China,” Reuters, February 1, 2023,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us-official-acknowledges-japan-netherlands-deal-curb-chipmaking-exports-china-2023-02-01/>, 访问时间:2024年4月12日。

③ 《韩政府考虑配合美方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行动》,韩联社,2024年3月13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240313000500881>,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2日。

④ Conor M. Savoy and Shannon McKeown, “Future Considerations for the Partnership on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29, 202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uture-considerations-partnership-global-infrastructure-and-investment>, 访问时间:2024年4月13日。

PGII 在成员布局上更具全球性,注重亚太与欧洲的联动对接,从而整合所谓的“世界主要民主经济体”。在关键矿产布局上,2023 年 6 月,美国联合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试图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体系。

五、结语

传统的轴辐联盟体系与正在形成的盟伴体系都是一种网络形态。美国试图将结构相对简单的轴辐式联盟网络,扩展为美国、盟国与伙伴之间深化各类合作的盟伴网络,从而以相对低的成本满足自身战略需求,维持主导地位、增强竞争优势。根据节点构成与联系领域,对美国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的基本路径进行类型划分,有助于区分美国盟伴网络内部的不同合作层次、理解不同路径的相互作用与效果差异,为考察美国不同政府政策实践的延续与变化提供分析框架。在美国与盟国、不同盟国之间形成安全合作网络,是美国亚太地区关系网络的最核心部分,在奥巴马、特朗普与拜登政府的政策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大国竞争升级的趋势下,美国还逐步从三个方面扩展其在亚太地区的关系网络,即注重与地区伙伴和北约盟国建立较为紧密的安全联系、将契合美国战略需求的多元议题作为联盟网络内合作的重要方向,以及在这些多元议题上动员更广泛的亚太联盟外部力量。

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广泛的盟伴网络面临一个重要难题,即资源“投入一不足”的两难。盟伴是否积极支持美国发起的行动影响亚太盟伴网络的构建。维持联盟可靠性与部分盟伴因利益需求差异而表现出的对冲姿态,促使美国为拉拢关键盟伴而强化安全承诺与增加利益补偿,加大资源投入。一方面,盟国对联盟可靠性的质疑促使美国投入资源安抚盟国,以“锁定”对盟国的影响力。^① 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盟伴网络的扩展,不同的国家尤其是伙伴国存在差异性态度。^② 为拉拢更多的地区盟伴,促使其改变对冲姿

① Brian Blankenship, “Promises under Pressure: Statements of Reassurance in US Allian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4, No. 4, 2020, pp. 1017-1030.

② Sung Chul Jung, Jaehyon Lee and Ji-Yong Lee,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US Alliance Network Expandability: Asian Middle Powers’ Positions on Sino-US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Indo-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0, No. 127, 2021, pp. 53-68.

态,在争取第三方的竞争中提升优势,美国不得不加大外交与资源投入。在此过程中,对冲实施国也可能会利用自身战略价值与大国讨价还价,其议价机会的增多无形中对美国的资源投入水平提出更高要求。^①然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多线作战”的战略压力以及不同政府联盟政策的不确定性,都会导致美国无法持续地为动员盟伴而投入更多资源。这使美国难以建立一个全面且具有包容性的地区框架,以符合亚太利益攸关方的不同优先事项。^②未来,开启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政府将在拜登政府“盟伴网络遗产”的基础上,继续针对多个议题领域推进美国、盟国与伙伴之间的双边与小多边合作,但在“美国优先”与交易性思维的影响下,特朗普可能会延续第一任期内对盟伴网络的有选择、有重点构建。

① 韩召颖、李源:《国际关系中对冲战略的研究进展及启示》,载《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1期,第122页。

② Ryo Sahashi and Juhee Jeong, “South Korea and Japan’s Responses to the US Lattic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 System,” The ASAN Forum, January 15, 2025, <https://theasanforum.org/south-korea-and-japans-responses-to-the-us-latticework-for-the-indo-pacific-system/#12>, 访问时间:2025年3月10日。